

礼治与轮回

——读诸葛铠《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

文 / 古 怡

缘起

《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一书出版于2006年,是由苏州大学诸葛铠先生亲自组织几位中青年学者集体完成的一部服饰研究力作。尽管书非新书,且近四十万洋洋洒洒的文字读来并非易事,但此书展示出的“思想的张力、文化的吸引”每每重读起来都会扼腕兴叹。在一个高举文化产业、时尚产业大旗的当代中国社会,这部以思想文化为主线的服饰著作,似乎并不入调。但是,恰恰是在这种产业抑或商业大旗之下使它更为珍贵。这在于,对待传统文化,所谓的“文化产业价值”往往被更多地仅仅从商业方面去理解,而忽视了传统文化自身的人文价值。

就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状况而言,成熟有力的著作并不多见。老一辈的学者以沈从文、周锡保为代表,他们开启了古代服饰的现代研究。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涉及自殷商迄于清朝的服饰遗存与文献,对跨越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以窥见中国历代朝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哲学、伦理等等诸多风云变迁之轨迹。它可谓领先风气之作,提振了古代服饰文化的研究。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则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勾勒出我国自上古以至明清、近代服饰在形制规范上的形成、演变、特

色以及前后的递嬗、传承。它被称为古代服饰史学科研究的奠基之作。

就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来看,《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是以思想文化为主线来谈中国服饰的创新与祖制之争、华夏与夷洋之别、固守与开放之变,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服装史,也就是不按编年的‘条’,而按思想文化的‘块’来写,力图理清中国服饰演变的文化背景。很显然,这种研究路径注重了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价值,它把对服饰的研究,拓展至一个活生生的古人服饰生活的环境中。而实际上,只有注重好传统服饰的人文价值,才能使我们获得创新古代服饰的能力。与此同时,只有厘清传统服饰演变的背景与文化风格,才能理解曾经浇灌中国古人的中华文化精神,如何使他们的生命更具风采,使他们的人生更加丰满。而这种对于文化精神的追求,对于当下对待传统服饰过于表面化、过于商业化做法无疑具有矫正的作用。

礼治

在《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中,把儒家思想认同为古代服饰的主流。尽管儒家之前的《周礼》已创造完备的服饰体系,但通过儒家对《周礼》的继承与发扬,“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古代服饰主流思想”^[1]。在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社会持久的影响下,服饰被视为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汉派服装品牌感性价值体系模型研究》(2006Y216)

作者简介:古怡,武汉纺织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治天下”之道、“顺天道”之术、“正人心”之法。所谓“治天下”就是把衣冠政治化。就是利用服饰来施行尊卑之分、夏夷之辨。就是用服饰来区分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阶层,从形象上就能“别统一、明是非”,以形成尊卑有序、上下有序、华夷有别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2]所谓“顺天道”,就是指在形制上要与天道顺应,要以德配天。要以服饰来象征君权神授、天降预兆。所谓“正人心”就是通过以《周礼》为基础的一整套服饰制度来完成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教化。就是通过服饰来进行包括“君子之德”、“妇人之德”、以及“忠孝”等德行操守的教化。

应该看到,传统服饰文化的主体内容就是基于《周礼》而形成的古代服饰制度在历代的相沿承袭,其基本精神内核就是配合古代宗法政治的一种礼治精神。当然,就社会历史而言,这种礼治模式的产生根源于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众所周知,世界上众多民族其文明的发生都经过了一个原始宗教的发展阶段,也形成了自己的仪式法则系统。但唯有在中国古代形成了“礼治”模式。而不同于象西方古希腊那样很快走上契约法治的道路。^[3]中国古代“亚细亚”式的历史道路决定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礼制模式、礼仪文化的形成。正如侯外庐的分析:古代中国社会最终在没有改变氏族关系的基础上,就发展了宗法人伦制度,从而进入奴隶制国家。而古希腊人却是革命了他们的氏族制度,变氏族制度为城邦民主制度,即按地区来区分城邦的原则代替氏族制的血缘关系原则分封。^[4]

轮回

如果说“礼治”是《文明的轮回》对于历史的总结,那么,“轮回”则是要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的。对于中国服饰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发展,该书概括为“哑铃图式”。一端是充分发育的被称为“衣冠王国”的古代,另一端是蓬勃进取的现代。这个现代,是在“以洋为新”的观念基础上现代,它使“衣冠王国”在近代的短暂衰落后步

入了全新的发展轨道。本书所认同的中国服饰风格的现代复兴,它也充分体现出对我们“衣冠古国”的文化自信心。当然,“轮回不是平面的周而复始,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中国风格的服饰,已不是古代服饰的重复,现代生活方式已容不得宽袍大袖和长裙雅步”。“轮回离不开古老文明的风韵。”^[5]应该看到,在历史观上,存在“复古复始”的继承观、“反经合道”的流变观;也有自主创新、以洋为新、师夷长技、上下流通。

总之,中国古代服饰在精神层面体现了效法“天地之德”的伦理精神与“人伦之德”的德行要求。从而影响了古代服饰成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一种思想道德的附庸,丧失了其自身的独立性。在服饰已成为一种商品的今天看来,中国古代服饰在历史中作为一种具体器物缺少自己独立的地位与品格,而只能更多地被作为一种观念的产物。其作为衣服的服用功能从来都是服从于社会功能。它更多地强调了阶级组织的“共性”,而淡化了具有性格、年龄、习惯等人的个性。

然而,在另一方面,古代服饰的礼治精神作为儒家德性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把人们的人格理想,指引到现实生活中自觉完成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人伦践履之上,从而有力地维护了现实的社会生活秩序。并且,这种基于血缘仁爱的德性精神,没有使人处在与自然与社会与精神的深刻矛盾之中。而是把人们指引到在现实生活中自觉“完成”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人伦践履,以达到“天人合德”“与天地同流”的合一境界。

参考文献:

- [1][2][5] 诸葛铠. 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M].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6: 89、94、3.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6卷上, 人民出版社, 1973: 484.
- [4] 侯外庐等. 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M], 人民出版社, 1957: 11.

(收稿日期: 2014年10月7日)